

天下文丛

史潮与学风

李伯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下文丛

史潮与学风

李伯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潮与学风/李伯重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天下文丛)
ISBN 978-7-300-17005-3

I. ①史… II. ①李…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1519 号

天下文丛

史潮与学风

李伯重 著

Shichao yu Xuef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1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1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学者治学离不开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大小之分，其小者即个人的工作条件，而其大者则为其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学者治学不能脱离时代，正如胎儿不能离开母腹一样。《红楼梦》中的妙玉，自称“槛外人”，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说到一些生活在虚幻之中的人时所说的那样，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时代对学者的影响，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潮流，一是学术风气。所谓学术潮流，是学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治学倾向，这通常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传统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时代特征，并对生活于该时代的学人的学术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又，学术群体进行学术活动，通常有一套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得到学术群体的认同，并在学术活动中予以遵循。这些规则以及学术群体对这些规则的实际执行情况，就构成了该时代的学术风气。这些规则因时因地而异，执行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各时代的学术风气也各有特点。本书之所以以“史潮（史学潮流）与学风（学术风气）”为题，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治学大环境的主要要素，而且更因为它们在当今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余年是一个罕有其匹的时期。在

这个时期，我国学者见证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① 这个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经济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洪流，并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我国的史学也摆脱了原先的自我封闭的状况，开始融入国际学术主流。在这 30 余年中，中国史坛上的学术思潮异常丰富，“新”与“旧”、“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洋”，各种学术潮流荟萃，相互撞击，相互激荡，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种局面给当代中国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机遇，激发他们去改进和发展中国史学。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史坛却未能建立起优良学术所必需的学术风气。早在 20 世纪之初，康有为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② 尔后，虽然也曾有一些较好的时期，但是为时不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学风更是每况愈下。因此，今日治学的大环境，既有令人鼓舞的一面，也有令人沮丧的一面。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学人应何以自处，也颇因人而异。

我自幼胸无大志，即使是在那个青年人真的相信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的 1966 年狂飙中，我也未有过“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雄心与豪情。我只想静静地读点书，做一个潜心治学的学者，尽己之力为学术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即如司马光所言“顾以弩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槧……庶竭涓尘，少裨海岳”^③。从那个时代的社会普遍价值观念来看，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既然心甘情愿地做了这样的选择，那

① 详见本书所收《论学术与学术标准》。

②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文集》，第 3 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960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不过我此所说的“少裨海岳”，意思与司马光原意不同，是为学术事业做出自己一份微薄的贡献的意思。

么即使人不堪其忧，自己也将不改其乐。所以我以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自勉，拒绝诱惑，潜心治学，“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予之明所能逆睹也”。因此，在上述复杂多变的学术大环境中，我力图努力学习新知识，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的学术资源，而对于每况愈下的学风，但求“独善其身”而已。

我向不做学术史研究，也从未被任何部门机构委以整顿学风的重任，只是出于对学界现状的关注，有时又不好意思坚拒朋友的邀约，因此在过去十多年中，就学术潮流和学术风气两方面的问题，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讲话，接受过一些采访。不料这些文章、讲话和采访发表后，颇受社会各界的重视，报刊和网站上多有转载和引用。这当然不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因为应当如何看待今天的学术大环境的问题上，我在这些文章、讲话和采访中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不一定被每个学者认同^①，但是它们表达出了一种声音：在今天，学术潮流和学术风气两方面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重视。由于这些问题深受学界乃至社会关注，因此我的意见才受到广泛的注意。

如今，又在朋友怂恿之下，从过去十多年中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和访谈中，选出18篇，结为这本集子。如前所言，我认为学术潮流与学术风气是学术大环境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本集子也分为“史潮”与“学风”两编。收入“史潮编”的有10篇文字，分为三组，主要讨论西方史学潮流及其与我国史学发展的关系。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史，因此这种讨论也以中国经济史学为重点。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是国际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主动地融入国际学术主流，中国史学才能顺利发展，从而在国际学术主流

^① 例如，拙作《论学术与学术标准》发表后，李存山先生发表《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对我的看法提出质疑。

中占有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分量。收入“学风编”的有8篇文章，其中的7篇分为三组，讨论学术与学术标准、学术批评、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在大学里如何培养优秀人才等问题。这里要说的是，其中关于学术批评的文章都写于十年以前，彼时在朋友的激励下，尚有心思讨论学风改进问题。自此以后，学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到了今天，已经积重难返，难以逆转。“再使风俗淳”，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因此之故，我后来也就不再多言了。另外一篇作为本编附录，谈谈我对大学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看法。

此次将上述文字结集出版，基本上依照原刊出的文本，仅作了个别的改动。这些改动主要是：（1）此次重读这些文章时，发现了一些原文中存在的错误，现已改正；（2）有些文章在发表时，因为报刊的特点，删去了脚注，现已补上。此外，有两点要说明：（1）本书所收的文章中，有一些文章讨论的主题相同或者相似，因此在讨论中未免有一些相似话语，本当精简，以免重复。但是因各篇文章都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如果将那些相似的话语删去，读者读到有的文章时，就可能感到不知所云。因此，本书只好将不同文章中存在的相似话语基本保留。（2）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来自我电脑中保存的原稿，有一些稿子在发表时做了个别字句的修改，但是这些修改过的文本现在无法一一找到。因此，收入本书的文章的文本，与原先发表的文本，在文字上可能有个别的不同。这两点，希望读者谅解。

最后，还要说一句：本书收入的18篇文章，无论从题材、风格，还是从体裁、篇幅上来看，都有颇大差别，有些是通俗的介绍，有些则是比较专业的讨论；有的本来就是访谈，十分口语化；有的使用的则是严格的学术术语。这种多样化，使得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倘若这些文章能够使读者在治学方面有所帮助，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目 录

史潮编

史潮澎湃：国际史学潮流/3

年鉴学派及其发展过程/4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9

迎接我国的第二次“新世纪，新史学”/29

放眼世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国际潮流/35

近年来的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36

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3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43

全球史视野中的清代中国经济/49

面对新潮：中国经济史学的应对之道/55

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56

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64

“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82

学风编

什么是学术与学术标准/111

论学术与学术标准/112

学术批评/127

学术批评：有规矩而无定式/128

学术批评琐谈/132

“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139

批评何必成冤家/148

学术“涉外”心态/153

我们该怎样读外国书/154

漫谈“文化接轨”和“接轨心态”/157

附录：如何培养优秀人才/167

大学应该培养文明的传承者/168

参考文献/176



史潮编

史潮澎湃：国际史学潮流

年鉴学派及其发展过程*

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派之一。它所发动的史学变革，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影响至广至大，对世界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他们（年鉴学派学者）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而美国历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则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团体能够望其项背”。这些评价并不是夸大。

年鉴学派因《年鉴》（*Annales*）杂志而得名。该杂志由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当时刊名《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36年刊址迁到巴黎。后来几经更名，1939年更名为《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1942年再度更名为《社会历史综合评论》（*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1946年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94年又改为《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在

* 本文刊于《百科知识》，1996（6）。原题作《“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

该学派创立之初，它不过是传统史学“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此外，这个学派也产生了像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的 20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并使得巴黎因此而得以成为世界史学的重镇。

年鉴学派自创立至今，已历时近七十年。在这一时期中，该学派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仅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而且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于第二代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大致而言，该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到该学派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1929—1945）是创立阶段。在此阶段中，主要的领导者和学术领袖是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在该学派创建之前，他们都已在新建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有鉴于传统史学中的种种问题，他们创办了一份新风格、新内容的史学杂志，以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这份杂志即《年鉴》杂志。该杂志一反以往史学期刊之惯例，务求超越各国史学之局限而达成国际学者合作之局面。他们首次提出了“总体史”的新概念，号召将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们的努力逐渐获得法国学术界的承认，因而费弗尔于 1933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布洛赫也于

1937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年鉴学派的重心也随之而转移到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学派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杂志几经改名，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被迫中辍。主要学术代表人物布洛赫更因从事抵抗活动而被纳粹捕获，并于其学术的黄金年龄被杀害，从而使得年鉴学派蒙受了严重的损失。

第二阶段（1945—1968）是极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鉴学派复兴，并有了巨大发展。战后不久，年鉴学派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以费弗尔为中心的《年鉴》杂志领导班子作了改组，并将杂志的名称由原来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更改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标志着该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第二件事，是经费弗尔的努力，法国政府终于同意于1947年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内设立了独立的第六系（即经济和社会科学系），由费弗尔任主任。他为这个系所确定的方针是，跨学科研究、向全世界开放、以探讨问题和集体调查为基础、历史在其中起鼓动和带头作用，等等。这些也正是《年鉴》杂志的宗旨，因此这个系也就成了年鉴学派的大本营。费弗尔于1956年逝世后，由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继任该系主任，并且他还在罗伯尔·曼德罗和马克·费罗的辅佐下，主持《年鉴》杂志的出版工作。布罗代尔是该学派第二阶段的旗手和领袖。在他领导之下，年鉴学派达到了巅峰，不仅逐渐成为了法国史学的主流学派，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他也因而被称为法国和欧洲史学界的“教皇”。在年鉴学派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三种时段”说、“结构的历史”说等，都是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发展完备的。计量史学的兴起（即史学中的“计量革命”）、历史人口学和人口史学的重大发展、区域史与系列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都发生于这一时期。

第三阶段（1968— ）是分化与扩散阶段。1968年，法国发生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大学潮。布罗代尔在此时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

务，由该学派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接任。1972年，布罗代尔又辞去担任了20多年的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系主任，由勒高夫继任。到了1975年，第六系改组成为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勒高夫任首任院长。因此，尽管一直到1985年逝世之前，布罗代尔在西方史学界仍然盛誉不衰，但是年鉴学派的领导权，已由第三代学者执掌。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新的史学潮流的冲击，新一代的学者力求突破学派的局限，将学派扩展为运动。由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此阶段的年鉴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早期的传统。到1978年，勒高夫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因此之故，有的学者将此阶段的年鉴学派称为“年鉴—新史学”学派或“新史学”学派。“新史学”的特点是“新”：提出了新问题，采用了新方法，从而革新了历史的传统领域。此外，还将历来属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也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新史学”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地位得以确立，调查和集体研究的方法得到采用，史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新史学”还特别重视将人类学作为优先联系对象，并且为政治史、事件史研究恢复了名誉，同时也把精神状态和感觉映像的历史作为一条重要战线，从而改变了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种太过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局面。这些变化，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

“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自创立伊始，年鉴学派就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之中。正因不断变化，所以也才能够一直保持活力。因此，对于年鉴学派，我们不能用一种孤立的、僵化的或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之，而应当将其视为20世纪世界史坛上的一种重要思想潮流，从而正确地认识这个学派及其贡献。

附记：这里简略地说说这篇简介的来历。这篇文字与我的经历颇有关系。我自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以来，虽然一直渴求了解国际学术主流，但是在1989年之前，虽然也读过一些“洋书”，但都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著作。我很想知道在“汉学”之外的广大学术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进行第一手的实地了解。1989年我应邀去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学，乘此机会，向法国同行请教，他们向我推荐了Peter Burke的*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通过此书，我得以初步了解年鉴学派及其代表的史学思潮。后来我在美国购得布罗代尔的巨著*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阅读之后，获益良多。回国后，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对年鉴学派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该文发表到今天已近20年，而在这20年中，年鉴学派学者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译为中文出版了，我国史学界对该学派已不再生疏。但奇怪的是，在谈到该学派时，许多中国学者却仅知其名而对于其大致情况仍一无所知。因此之故，我觉得这篇短文在今天还有一定意义。至少，让那些没有时间读更多介绍的学人，可以对这个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之一的年鉴学派有个起码的了解。

本文刊出后，年鉴学派继续在发展，现在已到了第四代，代表人物是雅克·莱弗尔(Jacques Revel)、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安德烈·布尔基埃尔(André Burguière)等。他们一方面继承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挑战本学派前代学者所建立的典范，研究范围逐渐从经济史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文化史。